

Matthew H.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xiv + 478 pp.

張孟珠^{*}

傳統中國當真如刻板印象所認為的是「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多妾」）社會？貞節意識籠罩下的父權家庭能有「一妻多夫」（招夫養夫、典妻、縱妻通姦、結拜兄弟共妻）存在之空間嗎？在清人的價值認知裡，「婚姻」與「賣淫」果真界線分明、不可相容？本書作者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繼《明清中國的性、法律與社會》（*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0）之後，歷十數年再磨一劍，細密爬梳清代州縣檔案（四川《巴縣檔案》、四川《南部縣檔案》、直隸順天府《寶坻縣檔案》、北臺灣《淡新檔案》及若干刑部現審案）與中央檔案（《內閣漢文刑科題本》「婚姻姦情類」），不僅回應了上述這些問題，也補充或修正今人對清代傳統中國社會的認知。

清代小民之間的賣妻、一妻多夫等悖禮之俗，與大清律例構成尖銳的對立；這等現象，正是作者考察討論的焦點：官方司法體系如何與民間習慣相互作用、調和與並存？本書以刑科案卷為主幹，所論不止於清代法制，還涉及性別、法律文化，更是一部關乎底層小農的社會生活史。作者的學術靈感，來自過往聚焦於農民生活經驗、旨在探究近代中國危機與革命根源的社會經濟史；其理論架構，首先承續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提出的中國農村經濟內捲化（involution）的概念。當農家僅賴小塊土地無以餬口，唯有訴諸手工藝或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2011）

其他副業來補充收入。絲蠶、棉、麻、手工紡績之外，女性的「性」與「生殖」能力，更是未盡利用的家庭勞動力，她或她的丈夫可將其用以出售、租賃或給其他男人僱用。於是乎，妻或常規性的、或打工式的「性工作」，成了另類家庭「副業」。本書至少使用 1,200 件清代（1644-1912）刑科案卷為據，輔以其他判牘彙編、風俗調查、契字、方志等等。除了援引史料、詮釋供證，還兼採計量之法，針對案件環境、情節、動機以數字呈顯，論證婚姻、性及生殖能力如何轉化為一種創造性的求生策略，使瀕臨無產的小農家庭得以在人口驟增、性別比失衡、土地碎化、農業內捲等日益不善的環境中殘存下來。

本書第二個理論支點，來自古典社會人類學的漢人鄉村聚落研究。以農村中的性別、親屬關係及社區共同體為焦點，影響昭著者莫若武雅士（Arthur Wolf）、葛希芝（Hill Gates）、孔邁隆（Myron Cohen）、吳爾芙（Margery Wolf）、斯托卡德（Janice Stockard）等。各家共通之處，在以庶民（文盲或半文盲）的實踐邏輯為本位，將地方脈絡置於官方意識形態與正統規範之上。人類學研究訴諸田野調查，可補史料之未載、未備，有助於理解某些特定風俗儘管污名顯著卻還普遍流傳、歷久不衰；原因不外回應了小民男女的需求，解決正統規範所不能處理的問題。

最後，近二十年來性別史研究所驅，作者也將男性之間的結拜、義氣考量在內，視為「一妻多夫」之一因。同時摒除過往以女性為父權「受害者」的範式，轉向修正主義觀點，試圖超越「受害」與「能動」（agency）的二分法。從「窮人生存策略」的角度，探究傳統女性如何在儒教性別框架中創造有意義的選項；在沒有對立、反抗的前提下，去測試既有社會限制的彈性。

除導言、結論外，本書共計 11 篇章，切為三部份來談。第一、第二部份，可清楚捕捉作者援引人類學研究的痕跡；前者（第 1-3 章）專論「一妻多夫」，後者（第 4-8 章）則以「賣妻」為焦點。第三部份（第 9-11 章），集中討論清代司法體系如何協調正統意識形態與地方習慣之間的矛盾糾葛，主要聚焦於賣妻紛爭。

第 1、2 章從文獻所載引出「一妻多夫」的幫養模式。當家庭餬口無策，人妻在丈夫批准或默認之下，與一個或多個家外男子維持或暫或久的性關係，以換取後者金錢、物質的支助。其構成有二，一為近代風俗調查所稱「招夫養夫」之習；另一則是刑科案卷常見的丈夫與資助者建構擬血緣關係，塑成結拜兄弟之間的共妻現象。適婚女性稀缺、光棍驟增、對婦女的性與生殖能力的市場需求及日益加劇的小農經濟危機，使賣妻、一妻多夫得有用武之地。既是貧、病所驅，親鄰或有同情、或不說不問（卻心知肚明）；即令介入，治標不治本，恐未必有效阻止。女性對自身之性與婚姻的務實態度、乾親關係、男人之間的金蘭結拜等等，也是暗中推手。遊食在外、得不到親屬奧援的邊緣者拔高兄弟之義遠甚夫妻之情，通財之餘連妻室也可共享。

第 3 章，以原夫對其妻殘留的所有權程度（即：妻與丈夫、夫家疏離，被讓渡給第三者的程度）為標準，呈現一個漸進的求生系譜。「一妻多夫」（招夫養夫、結拜兄弟共妻）與「賣妻」分處於系譜的兩極；在這中間還存在開放婚姻（2 至 4 個家外幫養者，並未與夫妻同居）、丈夫為妻拉皮條的零售性賣春、約限立契將妻抵押娼寮（或某個賣春經紀人）、典妻等等。諸如此類，無一不在動員妻的性與生殖能力來支撐家庭，同時也模糊掉「婚姻」與「賣淫」之間的界線。

第 4 至 7 章，討論人夫直接而公開的賣妻，即明、清律所謂「買休賣休」。兩造多為三十幾歲男性，典型的賣方（本夫）多半已與妻維持十餘年婚姻生活；反之，有超過 2/3 的買主（後夫）卻是初婚。買受人妻相對便宜，但也要花上買主好幾年的辛勤積蓄；刑科題本所見，約當一個農業勞動力 2 至 4 年的薪資。只要該人妻是健康、肯勞作，便值回票價。買娶人妻固然為生子、繼嗣，卻不止於性與生殖，還包括妻的勞動力——她是一個生產者，「買休」應被理解為附帶經濟效益的投資。交易由兩造協商，在媒人說合與親族見證下，以本夫名義將各項協議載入書契，並交付買主收執存證。妻本身的姿容、勞動力、生殖能力外，足以影響身價者，還有污名、不法、唯恐不肖之徒藉機勒索的畏累心

態，使買主極力壓低價錢，以抵銷買娶「生人妻」之風險。外在環境的昇平、饑饉也是攸關，荒歉時刻賣妻鬻子者眾，量增價跌勢所必然。孩子是否隨母帶入買家撫育，是短暫寄養、日後還要歸宗，抑或買大附小、兩皆賣斷，也連帶影響財禮的砍價或加碼。

習俗作法、方言諺語等，在在投射妻子與土地之間有異曲同工之處。本夫已山窮水盡，致賣妻求存；如需款孔急，勢難擇人而賣，議價空間也隨之壓縮，或被迫接受低價。事後發現錢文短少，尋來「找價」。社區輿論同情賣妻求活的弱者，認為買主之得獲一妻，不過是佔了本夫時運不濟之便。多數案例容許一次找價，然若一而再、再而三，買方也要備感詭詐而堅拒，求索不遂則糾紛立起。除了賣妻契字，媒人、買主也會要求賣方出示「請字」、「認約」、「服約」、甚或到官「存案」等等，以免除後患。一個沒有妻子同意或消極合作的買賣，終究難以成事。她得起意／迎合嫁賣、率先開啓一段縱姦／幫養關係，抑或回娘家告狀、對街坊訴苦、撒潑胡鬧，甚至自殺、告官來阻止或破壞一個非所預期的協議。只要不離開她所熟悉的地方脈絡與親緣關係，這類以女性為媒介的殘存策略，恐怕還是那乍看羸弱的妻擁有決定權。她們究竟作何反應、採取什麼行動、收效又如何，端視其性格、所處的環境及夫妻關係的親疏而定。

第 8 章的研究焦點擴及 4 種間接、變相的賣妻：由娘家充當掮客的「離婚補償」、丈夫離鄉經久不歸的嫁賣、設局詐賣及寡婦再醮。「扯謊造偽」貫穿此 4 種變奏情節。前三者丈夫仍存於世，只要妻對買主隱瞞過往的婚姻史，所有意欲詭詐的設局，都不難妝點成「寡婦再嫁」。如此喬裝妄冒，無非爲了提高收益——寡婦再婚比起嫁賣生妻，更易於說合成交；前者所得財禮也遠比後者的身價高。從一個更大、更廣的脈絡看來，「賣妻」構成婚姻系統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第 9 至 11 章則解析相關律例之沿革，並探究各級衙門如何裁量定奪。承繼作者《明清中國的性、法律與社會》一書的論點，雍正以降的司法變革，無分良賤地將所有娼妓、賣淫入罪化。沿襲明律而來的「買休賣休」、「縱容妻

妾與人通姦」也從嚴解釋或給予新的詮釋；在明代未必不法的「因貧賣妻」，卻是觸犯盛清「賣休」條例的「犯姦」之舉。矛盾的是，大多數賣休是因貧所驅而非淫蕩使然，事先也未必有犯姦實跡。「因貧賣妻」究竟該作何處置，成為明末到有清一代擁護律例基本教義、強化貞節理想的絕對論者與妥協環境、主張寬宥權宜的務實主義者之間，議論交鋒或各抒己見的場域。前者不以「貧窮」為賣妻開脫之理；後者則敏於危機意識，試圖緩和律例與現實間的矛盾。然而，終清之世，折衷、彈性的議處方案從未正式纂成定例；寬大倡議得不到國家律典的背書，州縣官針對審轉覆核之重案，寧按律擬罪量刑，也難冒部駁之險擅行寬宥。即便如此，看似佔了上風、力主依律究處的絕對論者，始終面臨頑固社會現實的挑戰。因貧賣妻不減反增，基本教義之於農村日益升高的社會危機束手無策，清律在「理念」與「實踐」之間遭遇的摩擦阻力也從未消解。

假設權宜的務實論者在審判中毫無作用，也不盡正確。依然有部份上憲官員不受絕對主義影響，在事實上承認了因貧嫁賣。基層州縣官處理審轉覆核的題本重案時，固然按律擬罪；在不必上呈覆核的賣妻「細事」上，卻往往批准庭外調解之決議。即令開堂問審，則無論賣妻、縱姦抑或一妻多夫，依然不拘泥於清律所載，以斟情酌理、彈性審斷為主流。較之過往對傳統中國法爭議不休的範式，作者據其賣妻、縱姦研究所見，知縣斷案並非樁樁件件按律量刑，大清律例只在非常規的、需經上憲官員覆核的「人命重案」上舉足輕重。一般尋常賣妻、縱姦「細事」中，州縣官的處置是滑動的、「權衡」各方利害（如：律例、人情及普遍存在的習慣作法）下的裁斷。這不必然等同「寬宥」，有時處刑甚至比律文規定還重（頁 364）；但也不乏引述律例卻並未強制執行的情況。縱然如此，「貧窮」仍不足以預測審判結果，總有某個案件相關人受到懲處，沒有證據顯示貧窮足以讓賣妻「細事」走到「除罪化」的地步。鑑於人命重辟原屬少數、特殊的例外之案，大部份的賣妻、縱姦糾紛停留在細事層次，因而會依循權宜的審斷模式。

本書重要貢獻之一，在論證「賣淫」與「婚姻」互補相成的共存關係。底

層社會的「一妻多夫」，實際是上層家庭「一夫多妻」的鏡像反映。階級、財富在女性的交換過程中扮演要角，少數菁英男性佔有多個女性，必然令為數眾多的底層窮漢，訴諸一妻多夫協議。賣妻、一妻多夫的共通邏輯，在於將女人的性與生殖能力商品化。此雖窮人生活下策，卻超越社、經範疇，深入菁英男性的內闈之中——窮人轉讓女眷來殘存，不啻為富裕男性開闢管道贏得更多女人。正統規範宣稱婚姻與買賣、婚姻與性工作之間界線分明、截然對立的關係，多少是維護菁英特權的意識形態構造；實際並非壁壘森嚴、持久不移，有時甚至是模糊不清的。從社會底層往上看，整個婚姻系統仰賴功能性、為求生而來的非法交易。舉凡一妻多夫（招夫養夫）、開放婚姻、縱妻通姦、典妻、賣妻等等，都在不同比例上、層次不等地銜接了婚姻與賣淫。即便正規嫁娶，富人厚奩嫁女不費吹灰，展示道德、榮譽之餘，也論證菁英女性「正妻」地位的獨一無二。窮人卻力有不逮，嫁妝遠不及於聘財；婚姻夾雜著「賣女」成分，聘財是對她父母養育成人的補償。窮人女性在父系金錢遊戲中，赤裸地被運轉、交換。如果「一夫多妻」將階級剝削帶入菁英內闈，那麼「一妻多夫」便是將性工作引入窮人家庭，是用以支撐底層社會生養化育的重要質素。窮人縱妻為姦，得避免賣妻鬻子、離散家庭，維持一個完整的家。賣春不必是婚姻的對立物，而是後者的支撐或補充。絕對論者嚴格執行律例以強化貞節，將賣妻殘存視若姦淫、把生存策略等同犯罪不法，實際不過是在懲罰貧窮。

本書試圖連結小農經濟內捲及雍正以降法律變革的嘗試，展現其宏大格局。在超過 1,200 起案卷為統計與立論的基礎上，不能不說已有相當程度可信與嚴謹。然其真正放入正文或註釋，予以細緻文本分析、解讀者，粗估約 380 件上下。其中，六成來自《刑科題本》，時間幾皆落在 1723 年（雍正元年，除豁賤民）之後，涵蓋乾隆、嘉慶、道光及光緒等朝，尤以乾隆、嘉慶為最。另有將近四成，來自地方檔案，總括乾隆迄宣統諸朝，尤以道光、咸豐為最。史料與理論近乎無縫的完美結合，不禁好奇這超過 1,200 樁案例究竟有何代表性？又是透過什麼機制或標準來篩選？僅僅是乾隆朝一部，《刑科題本》「婚

姻姦情類」也高達二萬多件，遑論各處縣衙在理論上，應保有自身所屬的地方檔案（即便已經亡佚或尚未出土）。本書所據 1,200 例在清代三至四億人口中，究竟代表了什麼？其中論點的有效性，又可往前回溯或向後延伸至何時？

既是真人故事，自可合理化為代表當事人本身；在農業內捲的立論背景下，毋寧也代表了農村中無產或半無產的小農境遇。細論之，刑科題本往往是複雜的故事，某些訊息並非定性、均質，甚或隨案情發展而變化。據此為統計樣本，抽樣條件至關重大。尤其財產、社經狀況乃統計學中，隨時、隨勢而異的變項；若非關乎案情、或為免審轉覆核產生疑慮，也不是每個題本故事都有具體的財產或社經線索。如何判定案卷主角為「無產」或「半無產」，究竟是「逃荒」離鄉、「貧、病」賣妻抑或縱姦求活，作者終歸不曾區分細說。書末附錄 B 雖列有買賣雙方的職業統計，惜未加入時間變項，難以掌握期間的分布與變化；但兩造大率處於社會金字塔中下，殆無疑義。作者也一再暗示賣妻、縱姦經常發生在年關前後、債主催逼之時（如頁 103、122），貧窮、負債誠然是驅動這類協議的大宗。然而，並非所有餬口無策的窮人都訴諸於此，也未必每樁協議都是為了殘存而就，買休人妻、作為資助一方者，不無身分相對較高的低級監生或小商遊賈。作者也意識到法律案件受其特殊性所限，許多議題無法精確量化，任何結論多少都是「暫時性」的（頁 19）。究實而言，本書將浩瀚如海之刑科案卷「理論化」的努力，已然精彩可期；面對龐雜、超出人為處理能力的生資料（raw materials），本難天衣無縫。往好處想，這始終是後生來者的機會——本書不是終點，若改以其他方法或理論架構、以不同條件擇取案卷、從不同視角切入觀察與提問，仍可望呈顯不盡相同的清代風景。

按本書的邏輯，隨著雍正帝除豁賤民，將所有娼妓、賣淫入罪化；在律例從嚴解釋之下，因貧賣妻成了一種可見的「犯罪範疇」，由此而生的糾紛、不法之案於是愈增愈繁。反向說來，婚姻脈絡中的賣春、因貧嫁妻早就存在，或也是王朝末世或底層社會尋常所見，只因此前沒有全面「入罪化」、未能浮出司法審判檯面而形諸文字。既然前代已恆有之，則非但不是新發明，反而是歷

久不衰。彰顯清廷無力解決道德與現實的矛盾及其背後隱遁的社會危機，也預示帝國崩潰的先聲。如此，則所涉是否直指或不止於經濟因素，統治的技術層面恐亦干連不清。近代政權是否 / 如何引進現代化治理技術，處理諸如此類傳統帝制統治無法根絕的習俗實踐，聊或值得一探，從而再思小農經濟內捲化之於賣妻、一妻多夫的影響與因果。

刑科檔案固是官員手筆，涉及司法系統、社會控制的公文書；然其本質仍是關乎人心、人性與人情的審判紀錄。本書亦論及「情」，雖未必深入全面，所論也偏於妻之一方。然而，案情發展的動力、故事進行的推手，是人物之間的「感情」。在作者細緻爬梳及理性論述的背後，熟悉文本性（textuality）的讀者仍可捕捉到散落於行文轉述、推論分析之中，涉案各方的情感、慾望與執念，甚或藏得深沉、未曾言明之作者的詮釋與主觀投射。最後，書末詞彙列表有幾處疑為錯漏，據信不影響讀者對全書的理解，姑不贅言。惟行文述及古代計量單位「石」，今漢語拼音做“dan”，不做“shi”（頁 78、160）。頁 171 第 8 行，“Zhang Shi’s family”，恐是誤植，似應為“Zhou Shi’s family”。頁 209 第 3 行，“Guo Kan”應為“Guo Kuan”之誤。頁 352 倒數第 8 行，“... ordered either the woman’s natal family or the seller’s family to pay the seller an additional sum of money”按上下文，“seller’s family”疑為“buyer’s family”之誤。頁 77 最後一段引述 1757 年，蔣興三縱妻劉氏與杜貴生通姦一案，漏註出處；實際應為“XT: #659-3, Qianlong 22.6.9”。以上糾謬，不揣淺陋揮筆而就，信其瑕不掩瑜也！